

深刻认识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

□ 李君如

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三次评价的共同点，一是强调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二是强调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三是强调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四是强调遵义会议为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当然，这三个历史决议三次评价，每一次评价的表述都有细微的不同。但是第三次评价有一个重要的结论不能看作是细微的不同。这个结论就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

毛泽东的“核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按照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所陈述的，遵义会议通过的决定，第一条就是“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遵义会议后在对常委分工时，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于当时党的领导主要是领导军事斗争，毛泽东由此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并承担起军事指挥的领导任务。遵义会议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带领大家作出的，不久就扭转了中央红军被动的局面，最终赢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邓小平在1989年五六月间提出并反

复强调的。当然，这不是说之前我们完全没有使用过“核心”这个概念。比如在1962年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就说过：“我们党，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都特别强调树立核心；后来，核心大体上树立了，就特别强调如何当好‘班长’。这就是说，一定要树立核心。不建立核心，处于涣散的状况，这个党委的工作是做不好的。”应该讲，邓小平在这里讲的“核心”，指的是党委的“班长”，和他后来强调的“党中央的核心”不完全一样，但又有联系，因为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也有一个“班长”这样的“核心”。

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的形成是一个过程，遵义会议“开始形成”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也是一个过程

众所周知，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泽东。但是，这一核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是一个过程。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开始形成”于遵义会议；1938年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思想政治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经过延安整风，1943年3月在调整中央领导机构过程中正式确认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并规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进一步以历史决议形式，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是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的确立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标志。

遵义会议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此来定性遵义会议的最大贡献，我们可以注意到，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的“开始形成”是一个过程，由此决定了遵义会议同样是一个过程。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结束“左”

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党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这和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同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坦诚交流沟通有关，和红军前线指战员的强烈呼声有关，但最重要的是与在危急关头党中央领导人先后举行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三场会议有直接的关系。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赞同，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渡过乌江后在猴场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不仅作出决定，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新根据地，而且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因此，遵义会议召开前的这三次会议和遵义会议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遵义会议的准备阶段。

遵义会议是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决战阶段，同时也是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开始形成”的决定性阶段。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为期3天的遵义会议，经过党内高层充分的民主讨论，毛泽东的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与会绝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同时，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进行适当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意味着他第一次进入了党的最高决策层。

遵义会议后的一系列会议，从扎西会议到苟坝会议，是毛泽东开始成

为党中央的核心的后续阶段。1935年1月28日在土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西渡赤水，以保存中央红军实力。2月初举行的扎西会议，正式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同时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扎西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建议，二渡赤水，回师遵义。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但是在后来举行的苟坝会议上，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人都主张攻打黔军占据的打鼓新场，于是就发生了毛泽东半夜提着马灯去说服周恩来的故事。后来证明毛泽东是对的，于是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接着，就是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红军变被动为主动，踏上了胜利之途。因此，从遵义会议到苟坝会议，是我们讲的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最后阶段。

“开始形成”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的遵义会议，有狭义的遵义会议和广义的遵义会议之别

综上所述，我们常说的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由遵义会议前的“准备阶段”、遵义会议的“决定性阶段”和遵义会议后的“后续阶段”构成的完整过程。再进一步考察，我们可以注意到，遵义会议前的“准备阶段”虽然对遵义会议有重大意义，但还不等于遵义会议。但遵义会议应该是遵义会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当时处于战争激烈进行的状态之中，遵义会议的全部议程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全部完成。事

实上，当时有的领导人没有开完会就赶回前线去指挥作战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也只能在遵义会议后的扎西会议上通过。成立“新三人团”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完全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只能在苟坝会议完成。也就是说，在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历史过程中，包括了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重要会议。由此可见，遵义会议有狭义的遵义会议和广义的遵义会议之别。狭义的遵义会议，就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为期3天的遵义会议；广义的遵义会议，还包括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

以史鉴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新时代党的建设历史同样告诉我们，从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提出“带头维护中央权威”，到2015年提出必须有很强的看齐意识，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直至形成“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这一认知形成过程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承继。

如同长征中红军战士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崇高精神，由于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及其力挽狂澜的正确领导，这些奋斗、这些牺牲才换来长征胜利的果实一样，今天我们要通过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并把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转化为造福亿万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也要靠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才能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创造出新时代的新奇迹。

我们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对遵义会议进行深入的再研究，不仅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邓小平关于“关键在领导核心”这一重要思想的现实意义，而且可以更加自觉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攻坚克难，完成历史 and 时代赋予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管党治党实践

□ 祝彦

早在1939年的战争年代，刘少奇就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好的共产党之一。“最好”在哪里？除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其他优势，还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管党治党、从严治党，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品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管党治党的积极探索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视党的纪律为“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文明蒙尘、淤泥遍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下，如何“出淤泥而不染”，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现实残酷地考验着共产党人的修养和品质。

把纪律挺在前面，是探索管党治党的一个重要举措。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就特别强调纪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作出了严厉的纪律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受此纪律约束，许多革命先驱放弃本来拥有的体面、高薪俸的工作，成为职业革命者。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党对纪律的强调更为严格，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就专门单列了“纪律”一章（即第四章），一共列了9条纪律要求，提出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欠缴党费三个月、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泄露本党秘密等给予开除处分。在管党治党的严苛纪律面前，一些意志薄弱者离开了组织甚至投靠反动集团，突出的反面例子就是陈公博和周佛海，由于违反党的纪律被开除党籍。正如五大党章所强调，“严格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

积极探索管党治党的另一重要途径和举措是开始注重反腐败斗争，并建立党的纪检机构。1926年至1927年初，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党员人数出现了剧增的势头。社会上的投机分子，甚至反动政客“也来敲CP（即中共）的门”，“同志中之一部分，发

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为了保证纯洁性，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4日发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同时，党的五大成立了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为管党治党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由于大革命失败前后的白色恐怖，反腐败斗争没有来得及在实践层面普遍开展，但是管党治党的探索为此后党的自身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带出“苏区干部好作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革命的燎原之势，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革命重心转移到农村，党员和红军队伍的来源自然以农民为主，正如毛泽东分析指出，“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由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根据地党政军内不同程度地存在，具体表现为不要党的领导、抵触思想政治工作、不愿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无组织无纪律、喜欢走州过府等。如何塑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努力。

管党治党从源头抓起，严格入党条件。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为管党治党治军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还指出发展新党员要注重质量，规定新分子入党必须做到：（一）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二）忠实。（三）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四）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五）不吃鸦片，不赌博。

通过建立机构、完善制度，为管党治党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中央苏区先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人员部等机构，并要求“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的执行铁的纪律……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

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与此同时，先后建立了财务预决算和收支使用制度、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建立专项审计制度等。

制定反腐败文件，并依法严惩腐败分子。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根据这个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严肃查处腐败案件，深得民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管党治党效果显著，带出了“苏区干部好作风”。

形成“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最长的时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水平、能力和修养、作风。这是因为：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成分复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旧的封建残余势力与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思想相较量。特别是国民党内的贪污腐败以及国民党对共产党员进行拉拢、腐蚀，使我们党面临着被腐蚀和官僚化的严重危险。第二，新民主主义政策在经济上允许私人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给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侵袭党的肌体提供了可能。第三，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好坏，直接影响人心向背。这一时期管党治党的探索实践非常成功，交出了合格的答卷。“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口碑，就是对共产党执政的高度肯定。

基于面临形势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建设廉洁政府的政治纲领，使管党治党建设更加纲领化、制度化、法规化。1937年8月，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1941年5月

1日，由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这些施政纲领的颁布，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立场。

为了建设廉洁政府，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并开展轰轰烈烈的反贪斗争。1939年至1940年，边区政府先后查处乡级干部贪污分子150名，区级以上27名，逐个驱逐出政权机关，将罪大恶极者绳之以法。1941年底，晋玉璧因贪污公款3050元，被执行死刑。《解放日报》发表时评说：“我们一定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实现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局部胜利走向全国胜利的时期。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军事斗争节节胜利之际，在“天翻地覆慨而慷”大背景下，如何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前夕面临的一道艰难的坎。党领导人民武装开始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面临新课题。

这一时期管党治党突出体现在加强纪律意识，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因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克服过去由于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下产生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为此，党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组织部门业务与报告请示制度的通知》《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规范党内生活的根本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对于加强党的

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活跃党内民主生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起了重大作用，为党夺取和掌握全国政权作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开展整党整军运动。自抗战胜利以来，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到1948年党员已发展到300万。为了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各解放区基层党组织从1947年冬天开始，结合土地改革开展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基本内容的整党运动。经过整党，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

制定惩治贪污条例，打击贪污行为。东北行政委员会、晋冀鲁豫边区、淮海解放区和苏北解放区相继颁布了《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修正淮海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苏北区奖励节约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依据条例，有力打击贪污行为，纯洁了党员干部队伍，巩固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管党治党、从严治党，让解放区的群众看到共产党的品质和作风，发自内心的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探索，成功地将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一支队伍，凤凰涅槃式地锻造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组织，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其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启示。

学史明理